

看到这个题目,您可能会有点惊讶:不会吧?翡翠怎么会从美玉之王变成扑棱棱乱飞的鸟儿了呢?列位看官别着急,且听小子道来。

咱们先看看这俩汉字啥偏旁,您可瞅准了,假如包换的羽字旁,只是一个在下,一个在上而已。羽毛当然是跟鸟密切相关的东西,常用汉字里翱、翔、翻、翘、翅、翎等都或多或少跟鸟有关联。翡翠当然也不例外。

那翡翠究竟是种什么鸟呢?《说文解字》里讲:“翡,赤羽雀也。出郁林,从羽,非声。雄赤曰翡,雌青曰翠。”这里说的明白,翡翠其实就是赤羽雀,雄鸟红色叫翡,雌鸟青色叫翠。翡翠鸟,其羽毛非常漂亮,可以做首饰。宋玉在《神女赋》中写道:“夫何神女之姣丽兮,含阴阳之渥饰。披华藻之可好兮,若翡翠之奋翼。”很明显,文中所说的翡翠是鸟。

那何时翡翠从鸟名演化为玉名呢?原来,清代翡翠鸟的羽毛作为饰品进入宫廷,尤其是绿色的翠羽,深受宫廷妃嫔们的喜爱。与此同时,缅甸玉也作为贡品进入宫廷,同样颇受青睐。缅甸玉也多为红色、绿色,且与翡翠鸟羽毛的颜色很相似,所以人们称缅甸玉为翡翠,渐渐地这一名称也在中国民间流传开来了。

当然,也有学者考证说,翠在古代专指和田出产的绿玉,缅甸玉传入中国后,为了与和田绿玉区别,把它称为“非翠”,后来才逐渐演变为“翡翠”。不管怎样,翡翠先是鸟名,后才是玉名,这一点是确认无疑的。

### 思想者营地

## 稀奇古怪读书斋

董改正

书斋的名字最能体现书斋主人的性格和情怀。

曾国藩的书斋名为“求阙斋”,阙者缺也。《易经》曰:“日中则昃,月盈则亏,天地盈虚,与时消息,而况于人乎?”盈则缺,满则溢,保持“缺”是对自己的一种警醒,“求阙”其实是想不缺。

梁启超的书斋名曰“饮冰室”,这并非因为先生身居南方,酷热思冰。斋名来自《庄子·人间世》:“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,我其内热与?”意思是我早上接受了国君诏命,谁知到了晚上口干舌燥得饮用冰水,难道是我内心焦躁担忧吗?年轻时梁启超受光绪皇帝之命,变法维新,欲富国强国,建立少年中国,他的内心之焦灼须得饮冰方可。

著名语言学家王力教授的斋名“龙虫并雕斋”,何谓之?雕龙指专著,雕虫指一般的小文章。龙虫并雕意为不拘大小,只要我喜欢,我都弄它一把,他果然也做到了。

胡风的书斋叫“四树斋”,原因是他和妻子在院中种了梨、紫丁香、蟠桃、大白杏四棵树。冯友兰的斋名“三松堂”,其实并不深奥,只因家中庭院里种有三株挺拔的松树。丰子恺的斋名“小杨柳屋”,因为1922年他应邀到春晖中学执教时,在居所的庭院墙角亲手种植了一株小杨柳,夏天时他和一帮文人在树下吃螺蛳。

史学家谢国桢的书房取名为“瓜蒂庵”。人问原因,谢先生答曰:“别人都在搞堂堂正正的大部头史著,我搞的是一些零零碎碎的野史。别人像抱个大西瓜,我捡的东西恰似瓜蒂。”他这是自谦,也有自许,这是他的治学方法。

一代书法大家何绍基的斋名“不洗砚斋”。一般文人风雅,都爱叫个“洗砚斋”,挥毫泼墨后洗砚,是多么风雅的事哦!可何绍基却冷然一笑,笑得我汗颜。

西南联大迁到蒙自时,闻一多有了了一间书房,便整天呆在楼上书写,几乎不下楼来。他的好朋友郑天挺觉得这样对身体不好,便来劝他:“一多啊,你何妨一下楼呢!”旁边的几位先生也跟着说:“是啊,你何妨一下楼啊!”这句话说得多了,大伙都乐了,竟成了闻一多的雅号,闻一多也欣然接受了它。他被称为“何妨一下楼”先生,书斋便叫作“何妨一下楼”。

沈从文的书斋“窄而霉斋”和“窄而霉小斋”,说来更是有趣。1931年8月,沈从文应国立山东大学校长杨振声之聘,到国文系任教,住在福山路3号的小楼上。由于青岛比较潮湿,他给自己的居室取了个雅号“窄而霉斋”。虽然窄小但窗外景色很好,绿树红瓦、波光云影,他感慨地说:“海边既那么宽广无涯无际,我对于人生远景凝目的机会便多了些……海放大了我的感情和希望,且放大了我的人格……”位于北京银闸胡同的“窄而霉小斋”,原先是一个贮煤处,临时开个洞作窗,仅可容身,又阴暗潮湿。1932年巴金借宿了沈从文的“窄而霉斋”,两人十分相得。1988年,巴金惊悉沈从文病逝,他满怀悲伤地写下《怀念从文》的纪念文章,回忆起在青岛小住的那段日子和窄而霉斋。

黄永玉的斋名“老子居”,挺拉风的名字,也有故事。黄永玉流浪到泉州市,他那时未满18岁。在开元寺内,他爬到玉兰树上摘花,遇到一位“头顶秃了几十年”“还留着稀疏胡子”的老和尚,问他摘花干什么。他回答:“老子高兴,要摘就摘!”那和尚叹息:“你瞧,它在树上长得好好的……”“老子摘下来也是长得好好的!”“你已经来了两次了。”“是的,老子还要来第三次。”

这个老和尚就是弘一法师。他驯服了黄永玉的野性,使他觉得自己十分不堪。事已多年,弘一法师早已圆寂,黄永玉早成一代大家。但对于在弘一法师面前称“老子”这种事,黄永玉一辈子也不会忘记。上个世纪90年代末,黄永玉在北京通州修建自己的“万荷堂”,主厅就称“老子居”,由吕正操将军题写牌匾。他是要自己永远记得,要谦虚,要温和,要谦卑。

# 毛泽东的老师石润山

张东吾

在毛泽东的老师中,石润山是一个声名不显却才华横溢、著作等身,并给过他一定思想影响的人。

在很长的时间里,人们并不知道石润山是毛泽东的老师。在尹高潮的《毛泽东的二十四位老师》一书中,列举了毛泽东的两位邵阳籍老师,即张干、袁吉六,没有提到石润山。在《古今中外邵阳人》一书中,介绍了毛泽东四位邵阳籍的老师:张干、袁吉六、刘策成、孙俚工,而没有石润山。直到近年,黄露生出版《毛泽东的尊师风范》一书,其中列举了毛泽东的33位老师,邵阳籍的有刘策成、孙俚工、石润山三人。人们才知道,除张干、袁吉六、刘策成、孙俚工外,石润山也是毛泽东的老师。其实,不管是论资历地位,论才华成就,还是论对毛泽东的影响,石润山都不亚于他们中的任何一位。

石润山(1872-1948),本名广权,一名建勋,字一参,号蕴三,润山,新邵潭溪人。石润山与樊锥是同年、同乡,且同为拔贡,交往十分密切,曾一道参与湖南维新变法运动,领导邵阳南学会活动,也一道去日本留过学。从石润山送给蔡锷的挽联“教管子,教荀子,教韩非子,回首廿年,不料神州便是吾曹责任;对乡人,对国人,对世界人,同声一哭,如此健者更从何处得来”来看,石润山和樊锥一样,都曾是蔡锷的授业恩师。

石润山作为湖南督军兼省长刘人熙的高足,作为护国元勋蔡锷的老师,作为北洋

政府教育总长范源濂的挚友,如果奔仕途的话,完全可以仕途通达,有所作为。但他淡泊名利,除短期从政外,毕生以教书著书为业。他创办过驻省邵阳学校,担任过湖南师范学校教员、上海中国公学教授,出任过群治大学文学院院长和代理校长。他还长期担任船山学社社长,主持船山学社社务。

1915年5月7日,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旨在独霸中国的“二十一条”。袁世凯为了换取日本对其复辟帝制的支持,于5月9日接受了除个别条款外的一切要求。为了揭露袁世凯和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,湖南一师集资编印了由石润山编著的《明耻篇》。毛泽东仔细阅读后,在《明耻篇》的封面上写道:“五月七日,民国奇耻。何以报仇?在我学子!”并在《明耻篇》卷首《感言》篇里批注道:“此文为第一师范学校教习石润山先生作。先生名广权,宝庆人。当中日交涉之倾,举校愤激,先生尤痛慨,至辍寝忘食,同学等爰集资刊印此篇,先生则为序其端而编次之,云云。”石润山在反对“二十一条”爱国活动中的表现,是与他早年参加维新变法运动、具有民主革命思想相一致的,也与他长期在日本留学,熟悉日本国情有关。

石润山一生涉猎颇多,兼及辞章、诗律、经义之学,书法亦颇有造诣,是一位在文学、诗歌、教育学等方面都有著述的学者。石润山撰有《张子正蒙注论言》《老学今论》《说文匡解》《管子今论》《六书浅说》《苍

石山人文字谈》《政谈续》《燕尘录》《说诗解颐》《尚书今文通释》《曲台十论》《老子今论》《墨子今论》《四书今读》《易象的哲理观》等,编有《刘浏阳先生荣哀录》,谭人凤的《石叟牌词》也经他“整齐文字”,可谓著作等身。不幸的是,1932年“一·二八”事变发生时,石润山在上海的著作和藏书,遭日本飞机轰炸烧毁,无一幸存,而存于湖南的著作,也大都毁于1938年的长沙文夕大火。饶是如此,石润山仍有《管子今论》《说文匡解》《苍石山人文字谈》《六书浅说》等著作存世。著名学者董莲池主编的大型文献集成《说文解字研究文献集成》中便收录了石润山的著作。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曾为《管子今论》题签:“此书于抗日战争中出版,其时予在陇漠,不但未见,亦未知也。今日阅书于中国书店,得之。知其用力甚深,而仍不讳石君为何如人也。世之学者湮没不彰者何限,而我辈以居都市之故,遂易欺世盗名,书此志愧。”在顾颉刚先生眼中,他不仅为石润山的学术才华倾倒,而且深为石润山的名声不彰叹惋。

毛泽东从湖南一师毕业后与石润山交集不多,加上平静谦和、不事张扬的石润山又在解放前便去世了,从而导致毛泽东和石润山的这段师生情谊长期湮灭无闻。

(张东吾,新邵县人,其作品入选《邵阳文库》《芙蓉花开》《芙蓉国》《原上草》等多种选本)



崑山云海 郑国华 摄

### 煮酒论史

## 农夫进士张家钰

陈扬桂

说到旧时代的读书人,人们就会搬出吟风弄月、一觴一咏这样的词语,来描绘他们的骚情赋骨,或者用诗句“皓首穷经冷板凳,孤灯清影到天明”,来形容他们的寒窗苦境。似乎读书人天生就是那种远离老圃,不事稼穡,不识韭菜麦子的“物种”。

然而,近读光绪年间《邵阳县志》,从所记载的60来名历代邵阳进士中,也看到了一个另类,那就是农夫进士张家钰。《县志》称,张家钰“性沈毅,尤自刻苦。赴郡县试,徒步担簪”。

张家钰是邵阳(今属新邵县)新田铺人。他的父亲张其左,书读得不错,但连续多次考秀才都名落孙山,又气又恼,便弃学从农,领着自己的几个儿子发奋种田。田倒是种得很好,家也渐渐富起来了,但是富而不贵,照样受人欺侮。张其左自己走不通的路,便寄希望于自己的儿子走通,靠他们学有所成,光耀门户。于是,一家老小白天务农,夜晚教的教、读的读,指望向书里求富贵。而张家钰在兄弟中又格外勤奋好学,学业成绩自然更加出类拔萃。

在张家钰27岁那年,张其左感到已经难以胜任对他的教育了,就召集全家商议送他去宝庆府城读经馆。他自己也信心满满地说:“苏老泉,二十七,始发奋读书,

我与老泉同龄,应当以他为师,刻苦攻读,登科取仕,不辜负父母兄弟的期望。”为了不耽误父兄种田,他自己挑着一石大米和日用行李入校从师。在学堂里,他珍惜无农事缠身,一门心思读书的好时机,昼夜刻苦学习,从家里带去的被子都不曾解开过,读倦了靠在被包上打个盹,醒来了又苦读不已。功夫不负苦心人,张家钰没过多久就考中了秀才,享受到公家发给膳食津贴的生员待遇,后来,又有幸被选送到南京国子监深造。

转眼到了咸丰元年(1851)秋,张家钰正在路边的一丘农田里犁田,只听得一声锣响,三匹马冲了过来,在张家钰跟前停下。来人问道:“张家钰老爷家在何处?他已中举,我们前来报喜。”张家钰听了,暗暗惊喜,遥指自家房屋,对报喜人说:“就在那边,你们边走边打听吧。”然后匆匆从小路赶回家,刚刚洗净身子,穿戴整齐,报喜人已经到了门口。张家钰急忙出来迎接。报喜人大为惊讶,原来新科举人老爷竟是那位犁田的农夫!“犁田举人”从此在宝庆北路一带传为佳话。

一年后,张家钰又高中进士,取得了做官的资格,被朝廷任命为内阁中书。这一年,他34岁,虽然年龄大了一点,但相比年长他24岁的魏源,51岁才中进士,他算

幸运的了。然而,他本色不变,依然不带仆役,自己挑着铺盖卷到京城报到上班。可是,干惯了农活的张家钰,对内阁中书这种抄抄写写的文秘工作不感兴趣,干着干着,就找个理由回家了。

回家没多久,他应曾国藩之邀,帮他管理粮台,因为劳苦功高,得了个五品的员外郎。但是,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,张家钰无心做官,再次辞官回乡,把自己的住房取名为“勉耘楼”,家中藏书甚多,而且有不少珍贵的秘本、善本。他且耕且读,过着陶潜式的隐士生活。咸丰九年(1859),太平天国运动波及到他的家乡,农历四月底,翼王石达开的一支部队来到新田铺。他的所有藏书,连同他个人的文集《勉耘楼文钞》,全部毁于兵火。这一下,他身心受到很大的打击,从此抑郁寡欢,一病不起,刚满41岁就离开了人世。

在治学方面,张家钰既有过人的资质,又有超人的毅力,他学而不厌,博闻强记,取得了很深的造诣;在培育生徒方面,他以培植人材为务,诲人不倦,循循善诱;在自身的品德修养方面,他以许衡为人生榜样,一切言行务求合乎“义”的原则。

当然,有些著作对张家钰的记述,也存在值得商榷的地方。如1994年出版的《新邵县志》记载张家钰的去世年份是1859年,却同时沿用光绪版《邵阳县志》的说法,称张家钰在两江总督曾国藩手下“司粮台”。曾国藩前后三次出任两江总督,其首任两江总督是1860年。如果说张家钰在1859年去世了,那只能是曾国藩在做两江总督之前,请他管理过粮台。

(陈扬桂,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,文史研究员)